

中外移民社会适应的差异性与共同性*

朱 力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摘要:国内移民的人力资本越强,如教育程度越高、就业竞争力越强、经济收入越高,则越容易适应城市生活。而国外移民的适应则不同,移民越是来自发达国家,其收入越高、生活质量越高、越是有优越心态,越不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中外移民在社会适应方面共同性的规律则是,移民融入城市的动机越强、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社会交往越广泛(社会关系越多),越容易适应与融入城市。

关键词:移民;社会适应;命题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10-0087-07

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人口流动的频率越高。在流动的人口当中相当部分的人会在某个城市滞留下来,寻找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这些可以使他们驻足的城市,一定有着使他们滞留下来的因素。这种因素可能是一种经济的环境,他们可以找到一份借以安身立命的工作;也可能是一种社会关系,朋友的热情帮助可以使他们克服生存的困难,获得发展的机会;也可能是一种文化习俗,感到生活方式比较适应;也可能是一种人格的尊重,他们感到居民平等和气,有第二故乡的感觉。也就是说移民迁移到一个新城市后的社会适应,与诸多的因素有关,而且不同群体的适应有着显著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是由于移民群体自身的特征决定的,诸如他们的教育程度、技术水平、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也受到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对其社会适应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来自国外的移民,因其政治、经

济、文化的强势地位的背景,使他们不愿意主动地融入当地的社会与文化。

本文基础数据源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于2007年至2009年初的社会调查。其中智力型移民(从农村进城上大学后滞留在城市工作的人)233名,调查时间为2007年8-9月,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对样本逐一进行访谈。新生代体力移民(“80后”的农民工)328名,调查时间为2009年1月,他们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国外技术移民30名,调查时间为2007年10月到2008年4月,主要通过熟人介绍选取上海、苏州等城市中的外籍工作者、跨国公司常驻中国的外籍管理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国外学习移民即留学生33名,调查时间为2007年6月到2008年3月,调查对象是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以及河海大学这三所高校学习的非华裔留学生,调查方法亦是通过对半结构化访谈形式进行中英文交流。本文是对上述经验研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科学项目“城市移民的社会适应”(07JA840006)的部分研究成果。

究的一个概括与总结。与传统的移民理论不同,本研究发现了移民中一些新的特征与差异,也发现了一些影响移民适应的共同因素,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尝试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性、趋势性的命题。

一、国内移民社会适应的群体性差异

国内的智力移民与体力移民的适应对比鲜明,显现出较大的差异。智力移民是当前国内移民中综合素质最高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移民中的精英人物,这一群体的优势在于人力资本中的知识的优势。而体力移民的优势在于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强健,但在总体的综合素质方面前者处于优势,后者处于劣势。在两个移民群体的比较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人力资本越强,在一个城市中越容易适应;人力资本越弱,在一个城市中适应越困难。

所谓人力资本,就是通过投资形式,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能所综合构成的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曾经指出,人力资本的取得要靠投资才能获取,这种投资主要有五种形式,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保健支出、为就业需要所引起的必须的迁移。其中,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是主要的两种投资(Schultz, 1961)。总体上智力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适应起点较高,大多数超越了生存需要的束缚,在吃、住、行方面基本上得到满足,面临的是提高生活质量与发展的需要。而体力移民还在为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奋斗,由于受到的教育较少,缺乏文化知识或一技之长,人力资本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只能在获得性要素较低的劳动力市场中徘徊。经济收入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保障,或者说是适应城市的物质基础。其实这一命题的逻辑内涵应该是这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越高——职业价值越高——经济收入越高——越容易适应城市。这也可以形成几个副命题:

命题1:教育程度越高,就业竞争力越强;反之,教育程度越低,就业竞争力越弱。在社会学分层理论的研究中发现,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一个

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训练。在现代社会中,人力资本高低的重要标志,就是高等教育的文凭。它意味着个体在某个方面受到过较为系统的培养与训练,具有某些知识、技能、职业的特长。智力移民优势在于一是有一技之长,二是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而企事业单位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求职过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从职业信息的获得渠道与手段,到掌握知识与专业技能,比体力移民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位和较高的报酬。而且,智力移民在人力资本市场竞争中占据的优势地位不会随意消失,这一群体对知识技术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他们会持续学习,从而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也正因为智力移民可以凭借自身的知识、能力在市场中获得令人满意的工作机会,他们对某一特定单位的依赖性会降低,这也是68.18%的被访的智力移民不害怕失去目前工作的原因。体力移民由于人力资本不高,只能在技术含量低、收入低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中徘徊。

命题2: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高,则越容易适应城市生活。反之,教育程度越低,经济收入越低,则越不容易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对通过自己的努力、受过高等教育以后而进入城市的233名智力移民调查中发现:智力移民在经济层面的基本情况是收入、财产相对富足,经济条件相对优越。这一群体的消费水平高于一般城市居民,处于社会消费结构中等偏上的位置,且生活的恩格尔系数较低,生活品质较高;职业满意度总体较高,有一定的职业安全感;居住质量较高且居住条件在不断改善中。而体力移民在经济地位上大多在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之下,处于城市消费结构的低端。不同的移民群体有着群体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在市场中获取资源的多寡程度,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而生存的难易程度,又决定了他们适应与融入城市的程度。越是容易在经济层面能够立足的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障碍就越小,对城市的适应程度越高。

命题3:教育程度越高,适应城市的综合素质越强;反之,教育程度越低,适应城市的综合素质

越低。智力移民在适应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性,具体的表现为:第一,智力移民更加看重个体价值,有的移民在接受访谈时,坦然讲到“最值钱的是自己”。第二,智力移民比较看重知识的汲取,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这一群体有更强的学习欲望。第三,智力移民群体由于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一般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精神文明意识等,综合素质较高。第四,休闲娱乐和教育学习是他们业余活动的主要内容。第五,主动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们对迁入地的知晓度较高,大部分智力移民对迁入地有认同感、归属感,但其认同归属会因所处城市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一群体对迁入地的评价较为客观,对迁入城市有较高的满意度;他们在迁入城市的求职、消费、语言交流等方面有较高的参与度。智力移民通过在大学期间的城市文明熏陶,已经对城市有所了解与适应,走出高校,进入社会,仅仅是一个职业角色转换,而不是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体力移民则是劳动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全面变化,适应的障碍更多,难度更大。体力移民的学习能力、文化方面的综合也不如城市的大学生。智力移民与体力移民对待城市的心态有很大的差异。按照体制的惯性,智力移民自然是城市的居民,智力移民不存在选择城市的去留问题,大学毕业后的人事档案可以挂名在城市的人才交流中心。而体力移民根本就没有档案,在城市没有身份符号。许多城市出台了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劳动力的优惠政策。而体力移民在体制惯性下依然受到排斥,有一个去留的选择问题。智力移民在心态上是主人翁心态,体力移民是匆匆过客心态。这些群体性的差别因素决定了智力移民比体力移民在适应与融入城市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二、国外移民社会适应的群体性特征

本项研究中最有趣的是对来自国外的技术移民、国外的学习移民的适应状态中有许多不同于国内移民的发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经典的熔炉论、同化模式等移民理论,对国外移民的适应状况的解释失去了效力。这些理论将移民的适应理解为:作为弱势文化群体的移民在强势文化的影

响下,单向地放弃从前文化、生活模式转而完全接受新环境下的文化及生活模式,而同化则为适应的最终结果,文化适应是同化的途径。而“熔炉”模式也只是一种变相的同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多种文化模式的并存,但最终还是要同化为一种模式。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国外移民表现出的却是明显的反同化的倾向。当移民保持原有文化,不愿意与其他群体交流,就形成了区隔与分离。但是他们的区隔与分离与传统的弱势移民的区隔和分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的区隔是由于没有与当地群体交流、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分离更是一种主动的、高姿态的拉开与迁入地居民群体生活的社会距离,是在区隔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适应形式。解释他们的行为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外国技术移民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进入中国的路径以伴随外商投资的经济活动为主,以强势入场为开端,这种强势身份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作为外国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大优势,到中国就业的外国人是有资金、有技术、有文化、高素质的高层次移民,他们不仅是海外强势经济实体的代表,更是外国强势文化模式的载体,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强势移民群体。对国内移民来说,是人力资本越强,越容易适应城市,人力资本与移民的城市适应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对国外的移民来说,这一命题在经验中则不存在了,而成为人力资本越强,越不愿意适应与融入当地城市,人力资本与城市适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发现:

命题一:从地域空间看,移民越是来自发达国家,越不容易融入。调查中我们发现,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在中国的社会适应中融入程度最低。移民从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时面对这种落差时,会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来面对移居地的适应生活。这与中国的城市居民到落后的农村去做客时的优越心态非常相似。它的背后是有一种潜台词的存在,那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对比。作为外国技术移民来说,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优势存在,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在世界体系中有着较高位置。外国职业技术移民进入中国时的强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受到的不仅

是国民待遇,而且是超国民待遇。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可以获得高收入,过高质量的生活,在经济上没有适应障碍;他们在文化价值取向的独立性,使得他们不愿接受当地主流社会价值;他们没有要融入移居地主流社会的需要与动力,更没有弱势移民由于不被主流社会接纳而产生的自卑感、焦虑感。他们基本上不需要去移居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寻找支持,他们也不需要主动融入社会去获取各种社会资源。尽管外国技术移民在适应过程遇到了中西文化的摩擦和冲突,但是他们的强势地位和优越心态使他们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城市市民社会生活保持着距离。

命题二:从经济地位看,移民的收入越高(或生活质量越高),越不容易融入。国外移民在进入移居地时的经济状况良好,他们到中国来之前多是跨国企业的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属于本国的中产阶级。来到中国后,其强劲的人力资本与就业竞争力使他们身处于高级劳动力市场,得到了优厚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这些高收入的移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所以,无论是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层面,还是居住空间、物品消费、闲暇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都属于享受层面的,这种生活质量上的落差,将他们与所在城市的普通居民隔绝开来。而且,维持生活质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细节中也将国外移民与城市居民区别开来。在国内智力移民中我们发现,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越容易与所在城市融合。与上述的国内移民的命题相反,国外的技术移民是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越不容易与所在城市融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国内智力移民的收入高是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相比较的,是有限的略微的高出平均收入水平,他们还需要努力奋斗在城市扎根。而这里所说的国外技术移民的经济收入高,是高出许多倍甚至几十倍,经济地位的巨大优势使他们在移居地的生活更加倾向于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

命题三:从文化背景看,移民越是来自文化强势国家,越不容易融入。来自强势国家的移民本身对自己的母文化有高度的认同感,他们一般认

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是先进、优秀的文化,特别是遇到移居地的某些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或习俗时,这种碰撞就会更加强化他们对自己母文化的认同,因此,外国技术移民在中国城市的文化适应中,基本上保持了他们的独立性,极少主动融入。吉登斯对于移民同化的定义:同化意味着“移民们要放弃原来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标准。它要求移民改变他们的语言、衣着、生活方式和文化视角,作为融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吉登斯,2003:327)这种同化对于移民来说是痛苦的,基本上要经过几代人才能完成。但国外移民则体现了反同化的一种现象,强势群体依仗着自己母国的发达国家地位,仿佛自己也成为这个强大群体中的一份子,在新的国家不需要放弃原来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不需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反而要保持自身鲜明的独立性来彰显这种高贵与差别。“移民永久维系着对祖国的国家认同,这成为一种他们用以维系其文化认同的社会机制。”(广田康生,2005)学习移民虽然在学习中国文化,但这种学习更具有满足新奇的特征,而不是认同。这种学习不会削弱或使其抛弃他们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外国技术移民、大多数的留学生都表示并不想变成中国人。他们没有了解与融入中国主流社会的主观愿望,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清楚所居住城市的主要产业、领导人,不清楚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状态。有的甚至说不清楚中国的国家主席的名字。虽然他们对迁入地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也较为认同,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交往方式的接纳度也比较高,但是他们与当地人的互动程度却很低。

命题四:群体身份的认同角度看,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度越强,越不愿意适应与融入所在城市。群体认同就是指认为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西方移民群体与学习群体在中国无法避免各种文化差异方面的磨擦与冲突,在文化冲突中会出现认同问题。但在调查中发现,国外移民面对“我群”与“他群”的界限并没有产生身份归类的困难,也就是说没有产生认同危机。他们不需要把自己重新归类,他们的身份非常的稳定和

一致,他们就是:外国人。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移居地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母国的文化模式并没有变迁。虽然他们按照自身的文化标准指出中国文化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往往都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这种态度是消极的、冷漠的。他们不仅没有学习这种文化的愿望,更没有改造这种文化的动机。他们观察中国文化的画外音是“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或者说“中国人怎么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的观察比较中立,有着独特的见解。可以看出,在中国城市的适应生活,外国技术移民与学习移民遇到了很多他们不理解或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是,对于自己不能认同的东西,他们往往会采取绕开的方式,只做后台的了解和侧面的观察而不去做正面的接触。中国城市对于外国技术移民与学习移民来说是一个不带有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空间。他们强烈的心理优越感使他们对其母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这种心理优势越强,他们在移居地旁观者的身份与心态就会越清晰,不愿意降低原有的地位和身份去融入地方社会。

三、移民社会适应的普遍性命题

那么中外不同的移民在移居新的城市后在社会适应方面有没有一些具有共同性的趋向或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试图对此进行总结:

命题一:从移民动机看,移民融入城市的动机越强,越容易适应与融入城市;移民越是具有临时的心态,越不容易融入城市。美国社会学家格斯柴德(Goldscheider, G)指出,移民的社会适应是作为适应主体的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的一个过程(Goldscheider, 1983)。移民社会适应的程度是与移民的能动性、积极性紧密联系的。移民越是有明确的留在城市的意愿,便越会积极利用各种资源主动与迁入地接触与联系,其社会适应的程度越高。智力移民进入城市后有着明确的留城目标,因此在城市积极地学习、工作,主动地建立人际关系、有意识地适应当地习俗和生活方式,参与城市社区的各种活动,甚至购置房产、娶妻生子,计划永久地居住下去。在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会想方设法排除各种

困难与障碍,顽强地在城市扎根。新生代体力移民强烈的留城意愿推动他们能动地积极选择和适应,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寻找与城市社会融合的有利契机,他们会主动地学习语言、习俗,主动地结交城市居民,有的发展成为朋友,他们追求职业的稳定性,降低迁移的成本。他们会主动地关心城市的信息与寻找发展机会。反之,外国技术移民与学习移民中有少数人出于对中国的喜爱与中国文化的迷恋,会有长期居留的打算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中国居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职业与学习的需要。这就使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空间的居留带有了明显的不稳定性,较少有永久定居的打算。确切地说,外国技术移民与学习移民在中国社会中的生活不能称之为融入,而更应该是一种嵌入。他们在中国社会的适应是一种旁观者的被动适应。他们并不是主动的去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文化模式,而是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逐步的去认识和了解。他们把到中国来工作、学习看成是对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对自身职业生涯的提升。他们中很多年轻人则通过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来突显自身的价值。所以,到中国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奇的旅程。他们在中国的居留过程里,扮演的角色更多的像一个行者一样,拍照、体味、游历,收获过去没有的经验和历练。他们是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有选择的去了解和学习移居地的风俗和文化。对于可以认同的部分,他们会接受,比如对当地语言的学习,对当地饮食习惯等。但是对于不能认同的或者认为有困难的,他们则会采取绕开的策略。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是一种水乳不相融的关系。越有长期性的居留目标,越容易适应与融入城市,越具有短期有工具性的动机,越会形成过客心态,越难以适应与融入城市。

命题二:从移民居留时间看,在城市的居住时间越长,越容易适应与融入城市。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短,越不容易适应与融入城市。移民在城市生活时间越长,对城市越是了解,在生活方式上对城市越是适应,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越是增多,越容易形成密切的社会关系,获得更多的帮助。一般的移民适应可以分为基本生活适应阶段、发展满足阶段、文化心理适应阶段。移民在城市中会

以一个阶段为主,其它阶段为辅。智力移民比体力移民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在城市上大学其实就是一个适应城市的实习期——也可称之为“缓冲式适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倾向于留在学校所在地工作,这种现象在东部沿海高校表现尤为明显,根据我们的调查,相当多的被访者拥有这种缓冲式适应。几年的高校学习经历,让他们对所在城市有了相当的了解,包括所在城市的语言习惯、区位划分、消费场所、交通要道、风土人情、特产名胜、历史传统等情况;如果他们觉得所在城市适合自己居留,便会做下一步发展的打算,如寻找工作,建立一些社会网络等。有了学校经历这一缓冲期,他们进入工作状态后,只要集中精力加快职业角色方面的适应便可,这极大促进了他们在迁入地的适应。而体力移民在这方面处于劣势,进入城市后一切从起点开始,要了解一个陌生的城市需要时间,在生活习俗、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等适应方面均需要时间,比起智力移民来遇到的适应的困难更加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城市工作的体力移民则将家人从农村接出在城市上学或打工,租房或买房,作长期居住的准备。从调查的少数国外技术移民看(7%),在中国居住了十年以上的移民在中国社会中的融入程度很高,他们不仅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像中国人一样自如工作和生活。时间使他们有了长久居留的考虑,有明显的融入当地社会,落地生根的意愿,并作出融入所在城市的行动。留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留学结束后回国,他们不愿意与当地的社会成员进行深层次的交往并保持一种长久性的互动关系,对城市的了解不多,几乎不接触市民,只是匆匆过客。

命题三:从社会交往来看,社会交往(社会关系)越广泛和越深入,越容易适应与融入城市,反之,社会交往越封闭越狭窄,越不容易适应与融入城市。社会交往具有多种功能,除了最重要的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以外,还有交友、交流信息、情感交流、心理宣泄、共同娱乐、价值认同、生活方式学习、适应,解决日常生活麻烦等多方面功能。要在城市生存与发展,必须借助社会交往这一渠道所建立社会网络,来获取有利社会适应的各种资源。

而基本身心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社会交往的途径才能实现。智力移民与体力移民中的大多数,在城市开始具有进行交往,突破初级群体的限制而与城市居民进行交往的意愿与行为。反之,国外移民在中国城市中的社会交往人数较少,交往对象单一,交往结构上具有封闭性。他们的交往对象主要集中在外国的合作伙伴、朋友、与中国人的交往仅限于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事。他们交往的封闭性是他们缺乏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需要与动机,与移居地本土的居民互动极少。另外,由于文化价值观和互动模式等的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他们与迁入地居民互动的途径。他们交往的封闭性不是由于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而是他们缺乏融入主流社会的需要与动机。经济、生活质量、职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已经满足了他们在移居地生活的基本要求。在他们的小群体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体系。学习移民也十分相似,留学生的移民链十分狭隘,靠本国留学生及其他海外留学生搭建起来的移民链使得留学过程较为便利、稳妥,在增进留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当新留学生到达目的地后尽快适应环境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本国留学生、其他国家留学生和少数中国本地学生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社会交往圈。总体来说,大部分留学生与中国本地学生的交往仅限于表面,缺少生活中的情感型互动,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深度不够。留学生感到和不同文化的人打交道很累很麻烦,宁可蜷缩在本国人组成的圈子里。固守本文化的“惰性心理”也阻碍了双方的交往和了解。智力移民依然比体力移民有着优势,一是他们有着体力移民所没有的独特的社会资本,即学缘关系,如校友、系友等关系。这是一种由过去的业缘关系发展而来的初级群体的关系。二是智力移民找到的工作单位相对体力移民来说比较正规,可以获得正式组织的支持的力度要大。三是智力移民的社会交往处于社会中上层,社会关系的质量比较高,能够获得的帮助大。国外移民囿于自己在亚群体中的交往,圈子狭小,社会网络稀少,对所在城市居民缺乏深入的互动,难以建立与城市居民间的情感联系,获得的社会支持当然也少。

命题四: 管理制度越严格, 对移民的适应与融入限制越大; 管理制度越松弛, 对移民的适应与融入的限制就越小。管理制度是对人们活动的规范, 但同时也是一种限制。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的居住制度(居住证制), 某些保护城市居民的用工制度等等, 这些管理制度的显功能是为了规范流动人口的社会秩序, 但潜功能就是一种迁移的限制。这种限制制度的存在, 提醒体力移民他们不是本地的居民, 有着身份的差别, 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与保护。同样, 面对国外的学习移民, 中国高校出台了許多保护措施, 最为典型的是校方人为的居住隔离管理制度, 严格的住宿管理制度将中外学生交往严格限制, 使留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得不到帮助, 减少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互动的机会, 非但没有

帮助留学生参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 反而使留学生始终与中国的教师、学生群体及与校园主流文化相疏离, 始终是一种“局外人”的身份, 无法真正融入校园的学习生活。

参考文献:

- [1] Schultz, T.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Pittsburg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1.
- [2]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 赵旭东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27 页。
- [3] 【日】广田康生:《移民和城市》,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 [4] Goldscheider, G. 1983,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 West view Press.
- [5] 【美】R. K. 默顿:《论社会学理论》, 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

〔责任编辑: 秦 川〕

Generality and Difference in Chinese-foreign Immigrants' Social Adaptation

Zhu Li

Abstract: The more human capital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such a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economical income, the easier they can adapt to the city life. The cases of the foreign immigrants are different. The immigrants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y who have more income, higher life quality, and the better mental attitude are mo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local society. The general law of social adaptation in Chinese-foreign is that when they have the stronger motivation to move to the city, longer time to live in the city, wider social communication, more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y can adapt and involve to the city easierly.

Key words: immigrant; social adaptation; proposition